

《周易程氏传》君臣民关系的民本思想根源及历史价值

程必定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肥 230051)

摘要: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涉及对君臣民关系的阐释,主张尊君与劝君、用臣与束臣、爱民与教民,其根源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传承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君臣民关系;民本思想;《周易程氏传》;程颐

中图分类号:K825.1;B2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3)03-0075-06

“君”与“民”居于国家的最高层次和最低层次,两者是什么关系呢?孔子认为是“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礼记·缁衣》),从而形成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世代传承。到了北宋,程朱理学对儒家的民本思想又加以丰富和发展,主要是把民本思想扩充到对君、臣、民关系等更为复杂问题的分析,并作出新的阐发,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作为程朱理学的经典,对此有很多阐述。该书涉及内容很广泛,但对《周易》很多卦辞、爻辞及孔子《易传》的详细解释,都有对民本思想的新阐发,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以民本思想为基本出发点,结合对时风时势的分析,以辩论思维详尽地阐释君、臣、民关系及治国平天下思想,主张尊君与劝君、用臣与束臣、爱民与教民并举,对北宋以后巩固中国“大一统”格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周易程氏传》中的尊君与劝君

程朱理学自宋元以来在中国思想界虽然居于正统地位,但长期以来也受到一些人的批判,有的批判甚至很严厉,集中点是认为程朱理学尊君而愚民,存天理而灭人欲,所以受到历代封建皇帝的重视,推至正统,成为愚民统治的思想理论工具。果真如此吗?只要细阅《周易程氏传》不难看出,这是很大的误解。不能否认程朱理学是尊君的,但并不是无条件的尊君,而是特别强调应尊什么样的“君”,如何尊君,希望

每位最高统治者都能做个受臣民所尊的好皇帝,这就是劝君。以劝君表示儒家的尊君,是《周易程氏传》的鲜明特征。程颐对《周易》六十四卦的阐释,在卦形辞意上只要有可能,都与劝君相联系,劝君也就讲述最多。显然,以辩论思维提出尊君与劝君并重,是《周易程氏传》的鲜明特征。

《周易程氏传》的劝君是从“天理”入手的,从散布在对《周易》卦辞、爻辞及孔子《易传》的详细解释中归纳起来看,主要是从为君之道、为君之德、为君之贤三个方面劝君的。

为君之道。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天理,所谓“天理”,也就是最高的、无容置疑的道理,如在《周易程氏传》开篇对“乾卦”的阐释,程颐就明确指出,“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也。”^[1]把如何为君称之为这样的“道”,天都弗违,为君的皇帝就更要遵循,不能违背了。程颐一开始就讲这样的话,似叫皇帝对他所讲的为君之道毋庸置疑。为君之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儒家主张的民本思想,《周易程氏传》对此就有大量的阐述。如在对“解卦”的阐释中说:“王者法天道,行宽宥,施恩惠,养育人民”^{[1]159},称以民为本、济民养育是王法天道;在对“乾卦”的阐释中又强调“王法天道”的极其重要性,认为“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1]3},意即统治者以民为本、济民养育体现天道的

收稿日期:2023-05-20

作者简介:程必定(1948—),男,安徽肥西人,研究员,安徽省程颢程颐理学研究会顾问。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规律,这样为君治国,国家才能得到安宁、发展。又如在“剥卦”的阐释中还说:“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1]92},称济民养育是统治者知理;在“坎卦”的阐释中甚至直指出,“人君之道,不能济天不之险难,则未为大,不称其位也”^{[1]118},治国以民为本更是统治者不可推辞的天然责任,人君若做不到就与其位不相称,言下之意甚至会被推翻,亦即民如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是也。可见,《周易程氏传》的劝君是认真的、严肃的。

为君之德。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如何才能承担起如此重大的人君之道呢?《周易程氏传》强调要有为君之德。与一般人对德的理解和要求不同,程颐认为君之德在于“无私”。如在“比卦”的阐释中明确指出,“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1]37},认为“无私,天德也”^{[1]54},人君应该具备这种最高境界的“天德”。虽然封建皇帝坐拥天下,程颐为什么还要强调为君之德是无私呢?在对“同人卦”的阐释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1]56},在对“萃卦”的阐释中将君德与百姓相联系,认为“君之德,民所归也”^{[1]184},这正是从民本思想高度的深刻解释。因为“普天下未非王土”,封建皇帝想要的东西很容易获得,但是,这样就会丧失民心,丢了民众,最后会失掉天下,不仅一无所有,甚至会丢了性命,遭后世唾骂,这是程颐从历史教训出发而作出的真诚劝君。因为皇帝有私会以上损下,就失去“民所归”,在对“损卦”的阐释中,程颐还以垒土为例,比喻为君无私之德的重要性,说“损上而益下则为益,损下而益上则为损,在人,上者施其泽以及下则益也,取其下而自厚则损也”^{[1]163},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则更是如此,只有无私之德的皇帝才能治好天下,劝君何其诚也!

为君之贤。在儒家看来,一个好皇帝不仅要懂为君之道,有为君之德,还要具有为君之贤,这在《周易程氏传》中讲的也有很多,而且特别强调识贤用贤,任人唯贤。如在对“鼎卦”的阐释中说,皇帝统管国家,但“天下之事,岂一人所能独任?必当求天下之贤智,与之协力”^{[1]204}。即使是有才能的皇帝也应这样做,如在对“坎卦”的阐释中就指出,“人君虽才,安能独济天下之险?”^{[1]118};才能弱的皇帝若有贤智协力,也是可以治理好国家的,如在对“丰卦”的阐释中有分析,“人君虽柔暗,若能用贤才,则可以为天下之福”^{[1]226}。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还特别提醒皇帝要远小人、近贤人,如在“解卦”的阐释中说道,“居上位而亲小人,贤人正士退远矣;斥去小人,则君子之党跟进,而诚相得也”^{[1]161},这里还强调了皇帝近贤人必须以诚相待。如在对“姤卦”的阐释中就指出,“自古人君至诚降屈,以正中之道,求天下之贤,未有不遇者也”^{[1]179},又如在“中孚卦”的阐释中有多处强调至诚,指出“人君之道,当以至诚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1]245};在“泰卦”的阐释中,还特别指出君臣都应至诚,认为“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1]45},强调以至诚搭建君臣关系,这样,朝廷能泰,国家便安。

二、《周易程氏传》中的用臣与束臣

在封建王朝,君臣关系对治国安邦极为重要,《周易程氏传》对此也有大量的阐述。细读程颐对《周易》很多卦辞、爻辞及孔子《易传》的解释,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以“顺”为主线,君要以“信”用臣,臣也要以“道”束己,形成用臣与束臣的君臣关系。这种虽“用臣”又“束臣”的辩论思维,也是儒家民本思想在君臣关系上的体现。

关于君臣关系要顺,程颐从正反两个方面作了阐释。如在对“巽卦”的阐释中说,“上顺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顺从,上下皆顺,重巽之象也”^{[1]230},“巽”有吉祥之意,这是从正的方面阐释君臣关系要顺的必要性;又如在“蛊卦”的阐释中说,“尊卑得正,上下理顺,治蛊之道也”^{[1]72},“蛊”是破坏之事,这是从反的方面阐释君臣关系要顺的重要性。对朝廷来说,君臣关系的“顺”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朝廷君臣之顺能治好国家、符合民心,如同对“巽卦”的阐释所言:“命令政事,顺理则合民心”^{[1]231}。由此可以认为,在封建朝廷,“顺”应该成为君臣关系的主线。

历史表明,封建朝廷的君臣关系能否“顺”,关键是君能否用好臣,《周易程氏传》就有很多这样的阐释,主要是强调君主要明,以诚待臣,以信用臣,这样,君臣和合,君臣关系就顺。如在对“巽卦”的阐释中说:“进盛之时,上明下顺,君臣相得”^{[1]138},意即在国家兴盛之时,皇帝要明,所作所为都不可糊涂,这样臣下办事就顺利,君臣都会各得其所。又如在“晋卦”的阐释中还说:“艰难之时,所赖在才臣”^{[1]254},意即在国家处于艰难的时候,就要信赖有才能的臣下,依赖他们才能共同渡过困难。为什么呢?在“屯卦”的阐

解中对此就作出了分析,认为皇帝“知己不足,求贤自辅而后往,可谓明矣”^{[1]18}。显然,这样的皇帝就是明君,无论是国家在兴盛之时还是艰难之时,关键还是君主要明,君臣相得就会和合,也正如对“鼎卦”的阐释所言:“上明而下才,终必和合”^{[1]204},君臣和合才会天下安。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通过对有关卦辞、爻辞的解释,还进一步分析,君臣关系能否顺,取决于君臣要有治国安天下的共同志向,这种志向是符合大众的期望,程颐称之为“从众”“众志”。如在对“晋卦”的阐释中说:“顺之极也,……谋从众则合天心,……大明之君,众志所同也”^{[1]140},意即君臣关系很顺的时候,君臣们从符合大众的期望谋划国家大事,是合天心的,明白之君的决策是与大众的期望相同的。明白之君的决策是要臣下去执行的,需要臣下的理解,怎样才能使臣下理解呢?程颐的解释是,君臣相感而使志通。如在对“咸卦”的阐释中说:“君臣上下,皆有相感之道,君臣能相感,志通。”^{[1]123}这样,君臣关系之顺就会更加巩固,小人离间也不会得逞。如在对“渐卦”的阐释中就这样评论:“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当行,虽有间其间者,终岂能胜哉?”^{[1]217}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有关卦辞、爻辞的解释中还进一步指出,君臣关系能顺,这需要人君的谦顺、刚正而和顺。如对“谦卦”的阐释就以卦释意提出了人君要谦顺的看法,认为“为人君而谦顺,天下所归心也”^{[1]64};在对“临卦”的阐释也以卦释意提出了人君要“刚正而和顺”的看法,认为谦顺“刚正而和顺,天之道也。……以此临人、临事、临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1]77}。如此,程颐还借对泰卦的释意得出了结论:“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竭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1]45},这正是孔孟儒家和程朱理学所执着追求的治国理想。

君虽然信臣用臣,那么,臣当然要尽其所职,但程颐在《周易程氏传》对有关卦辞、爻辞的解释中对朝臣的要求不仅如此,还要求他们以“柔顺之道”和至诚来约束自己,这可称之为“束臣”。如在阐释“坤卦”中提出的为臣之道,就有这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指出,“劳于事者臣之职也”^{[1]9};另一方面又指出,“上无忌恶之心,下得柔顺之道,……守职以终其事,臣之道也。”^{[1]11}这还不够,程颐还对朝臣们提出种种提醒与警告。如在对“小过卦”的阐释中就提醒,“臣不可过

臣之分也”^{[1]248},在对“小畜卦”的阐释中还特别警告,“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1]41}联系北宋以前五代时期臣过分、臣制君而导致国家分裂、天下大乱的历史教训,程颐对臣下提出的这些提醒与警告是有道理的。

朝臣如何做到这些呢?程颐在《周易程氏传》对有关卦辞、爻辞的解释中也做了回答,核心是对君至诚,以获君信。如在对“坎卦”的阐释中说:“大臣当艰难之时,唯至诚见信于君。……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诚实而已。”^{[1]117};在对“鼎卦”的阐释中还说:“大臣当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则不误君上所倚,下民之所望,与自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谓信也。”^{[1]205}并且指出,不用说那些普通的大臣,即便那些功劳大的重臣、敢谏君的诤臣,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如对“随卦”的阐释就说:“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诚孚而处无甚失也”^{[1]71},即功高震主的重臣而不被皇帝怀疑,是因为他们对皇帝忠诚而又没有什么过失;又如对“坎卦”的阐释还说:“自古能谏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明者也”^{[1]117},即历史上的诤臣能敢于对皇帝提意见,没有不明白对皇帝忠诚的道理。显然,用臣、束臣使君臣关系更顺,君臣能合力治理国家,对百姓是有利的,这也是《周易程氏传》所体现的民本思想。

三、《周易程氏传》中的爱民与教民

以民为本是中国儒家在治国方面的基本思想,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从理学角度发展了这个思想,主要是从义理观出发,强调以民为本治国是天道或天理对治国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朝廷君臣们治国的天然责任。怎样以民为本呢?通过他对《周易》相关爻辞、卦辞的阐释,主要是以辩论思维提出爱民与教民并重,还要围绕以民为本施善政。

关于爱民。《周易程氏传》饱含爱民情怀,寄托在对许多爻辞、卦辞的阐释之中,表达对朝廷君臣爱民的要求,而且有理有情。综合起来看,这些要求集中在“济民”与“安民”两个方面。

在“济民”方面,《周易程氏传》有很多阐释,对统治者提出了很多希望。一是从“资生”即发展经济的角度提出“济民”的极其重要性,如在对第二卦“坤卦”的阐释中指出:“资生之道,可谓大矣。……万物资乾以始,资坤以生,父母之道也”^{[1]10},天地乾坤为大,家庭父母为大,济民是让老百姓发展经济,有了经济就

可“资生”，人们才能生存，这就凸现出统治者“济民”的极其重要性；二是从“天道”的高度提出“济民”的极其重要性，如在对“解卦”的阐释中说：“王者法天道，行宽宥，施恩惠，养育人民”^{[1]159}，称济民养育是王法天道；三是从“理”的高度提出“济民”的极其重要性，如在对“剥卦”的阐释中就说：“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1]92}，称济民养育是统治者知理。四是从“德”的高度提出“济民”的极其重要性，如在对“蛊卦”的阐释中有说：“以振济于民，养育其德也”^{[1]74}，称济民养育是统治者之德，等等。程颐作为思想家，不可能提出“济民”的具体办法，但以上四个层面的见解，既有高度又有深度，足见对“济民”的重视程度。

在“安民”方面，对前面“比卦”的阐释中就提出“安民”的重要性，告诫统治者善治国应“以安民也”^{[1]35}，对后面一些卦的阐释也讲的同样很多，最重要的是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统治者“安民”重在使民志定，安民心，使人民能安心发展经济。如在对“履卦”的阐释中说，“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1]43}安民心才可以使民志定，在对“巽卦”的阐释中就对统治者强调，“命令政事，顺理则民心，而民顺从矣”^{[1]231}，即统治者的政事若能得民心，民志就能定，也就可安民。另一方面，强调统治者要重视社会治理，特别是治乱，使人民能安乐业。如在对“剥卦”的阐释中说：“阴道盛极之时，其乱可知，乱极则自当思治，故众心愿载于君子”^{[1]94}，统治者治世乱、保民安，是人民的重托，更是统治者的责任。为了有效地治乱，还应有必要的刑罚。如在对“噬嗑卦”的阐释中就明确提出，“天下之事不得合也，当用刑罚，小则惩戒，大则诛戮以除去之，然后天下之治成矣。”^{[1]84}“天下之事不得合”即乱，治乱世而用刑罚，当然是必要的，而且只有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才能做到。如在对“比卦”的阐释中就这样指出：“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宁，方且来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宁，君不能独立，故保民以为安”^{[1]35}，意即一个老百姓由于势单力薄，不能保其安宁，所以拥戴君王得到庇护，君王就不能只顾自己，而要保民安民。所以，在对“既济卦”的阐释中又进一步指出，“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1]252}；在“坎卦”的阐释中甚至直接指出，“人君之道，不能济天不之险难，则未为大，不称其位也”^{[1]118}，治乱安民是统治者不可推辞的天然责任。

关于教民。《周易程氏传》不仅强调统治者要爱民，而且还要教民，教民与爱民对统治者来说都同等重要。整个一部《周易程氏传》，就是一部教君教臣又教民的理学教科书，其中，就有很多内容是教民的，涉及修身、齐家，分布在很多卦辞的阐释中，但最重要的是以教化来教民。如在对“比卦”的阐释中说：“明教化以善其俗，……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1]20}前面提到，统治者为了治乱安民可以用刑罚，但程颐认为，刑罚只是手段，目的在于教化，还是在对“比卦”的阐释中就这样说：“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1]20}因为人的道德和习惯是养成的，而教化就是一种有效的养成教育，《周易程氏传》也很重视养成教育，如在对“离卦”的阐释中，就明确提出“人之顺德，由养而成”^{[1]119}，强调人应通过自我养成教化育德。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程朱教化百姓的最重要思想武器，是提出了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观。实际上，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对“损卦”的阐释中提的是“损人欲以复天理”^{[1]163}，对人欲并不是“灭”而是“损”，即减少，对天理并不是“存”而是“复”，即将被时风破坏的天理恢复起来，度的把握是有分寸的，语气也是平和的，在后面对“节卦”的阐释中还作出这样的解释：“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1]240}后来的朱熹秉承二程的思想，在文字上做些调整，使语气变得更尖锐些，旗帜鲜明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显然，这虽然会加大教化的推进力度，但也造成了理解上的偏差，甚至长期以来受到一些人的批判而被历史性地误解。

统治者如何做到爱民与教民呢？《周易程氏传》也做了回答，概括起来主要是围绕以民为本施善政。如在对“否卦”的阐释中提出，“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从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1]50}；又如在“贲卦”的阐释中还提出，“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1]89}程颐积极赞扬统治者施善政，如在对“观卦”的阐释中就赞扬，“当观天下之政化，君之道德可见矣”^{[1]82}，因为这是符合儒家以民为本而施善政的思想。难能可贵的是，《周易程氏传》还提出，统治者所施的庶政是否是善政，还要看在民间的实际效果，如在对“观卦”的阐释中就提出，“人君欲观已之施为善否，当观于民，民俗善则政化善。”^{[1]82}施善政有实际效果，说明人君对人民至诚，至诚会感通天下，如在对

“中孚卦”的阐释就肯定地说，“人君之道，当以至诚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1]245}，这正是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

四、君臣民关系的民本思想根源及历史价值

君臣民关系是中国封建社会治国理政的三大基本关系，如何对待君臣民，关系到封建王朝的兴衰，儒家一向以民本思想为基本出发点评价这三大基本关系，在很多经典中对此都有大量的阐述。《周易程氏传》则从辩论思维对这三大基本关系作出新的分析，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新发展。以上从程颐对《周易》卦辞、爻辞及孔子《易传》的大量解释中看出，这种辩论思维的新发展可归纳为对君是既尊又更劝，对臣是又用而又束，对民是有爱又有教的基本观点，其根源仍然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共生的世界大国，华夏先祖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大一统”意识，《周易程氏传》中的尊君与劝君，是传承“大一统”意识，对把民本思想上升到国家利益高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回顾历史，最早的华夏民族都是在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原始国家性质的方国，虽然方国林立，但分散而力单，更常常为生存而争斗，无数民众在争斗中家破人亡，遇到大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分散的方国生存下去都很艰难，严重阻碍了中华各民族的发展。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的一场洪水祸及华夏大地，大禹团结诸多方国战胜洪水，被诸侯方国拥为共主而建立夏朝后，我们的祖先更加认识到，天下弱小的方国结盟为统一王朝的必要性，“天下”意识开始形成，在《周易》《左传》《礼记》《论语》等典籍中，都有“天下”之说。经过春秋战国的纷争，先由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后由秦始皇统一华夏建立“大一统”的秦朝，“天下”意识又深化为具有国家形态的“大一统”意识，维持国家统一便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责任。历史的经验教训屡屡表明，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可以消除大中国“一盘散沙”的历史病症，从根本上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就应从国体上保障民本思想的实现。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屡屡表明，“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必须有位代表国家利益而有德贤兼备而又有权威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尊君就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比如，当年齐桓公就是因为采纳管仲的建议提出了拥戴周天子而“尊君”的政治主张，才得到诸侯的真诚呼应而“一匡天下”。古代的部落是

一个大家庭，首领如同部落的“头雁”，虽是部落的最高统治者，又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他们真诚地为大家庭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当然会受到整个部落的尊重，这种传统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也就演化为“尊君”，伏羲就是为部落的生存和发展而作卦《周易》，周文王也是为此而为《周易》注辞，“尊君”传统也就自然融入《周易》的原创思想，《周易程氏传》也自然就有“尊君”传统。但是，最高统治者又是自然的人，人非圣贤，以后的最高统治者更非是如伏羲、周文王这样的圣贤，自毁前程的“昏君”“暴君”屡见不鲜，而国人在“昏君”“暴君”的统治下又民不聊生，无民本可言，所以，劝君也就具有政治上的必要性。但劝君需要无私和胆识，程颐在青年时期就上书宋仁宗大胆劝君，晚年集终生的无私和胆识，在《周易程氏传》中系统地劝君，有理有据地传承“大一统”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意识，把民本思想上升到国家利益高度，对于警戒后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这也不难理解，元明清时期为什么把《周易程氏传》作为士子科举考试必读经典的缘由了。

第二，在封建王朝，君臣组成最高统治集团，君臣关系的和顺程度直接关系到政局的稳定。《周易程氏传》中的用臣与束臣，有利于封建最高统治集团的和顺和政局稳定，也有利于老百姓安居乐业，对把民本思想上升到国家稳定的高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君臣关系对治国安邦极为重要，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大量的乱世，老百姓是乱世的最大受害者，从表面上看，这些乱世是发生在民间，但根子却在朝廷，如宦官与朝臣之间的权争、外戚与皇族之间的利争、朝臣之间的党争、皇帝对大臣的怀疑、大臣对皇帝的背心，以及君臣惊人的奢侈腐败等，都是乱世的根源。正如明末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言：“国家之官坏国家之事”^[3]，而坏国家之事的最大之官就在朝廷。程颐接受历史的教训，主张君要以信任用臣，让朝臣们尽职，大臣要以道约束自己，不要过臣之分，形成用臣与束臣的君臣关系。这样，上下皆顺，政局稳定，天下可安，老百姓就免遭乱世之灾，从根本上保障民生，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是，把民本思想上升到国家稳定的高度，有利于儒家民本思想的实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程颐在谈及君臣关系时，还提出“志通”“众志”“从众”三个概念，认为君臣相感而形成志通，君臣关系就会和顺；君臣之间能够志通，就要做到众志成城；君臣形成众志成城

就要从众,亦即从符合大众的期望出发谋划国家大事,是合天心的,政局就会稳定。这样,把“从众”看成君臣关系和顺的落脚点,就是把民本思想看作是巩固君臣关系、保障政局稳定的根源。当然,受历史的局限,程颐那时是不可能从社会制度层面认识根源问题,而是从封建制度维护者的角度提出君臣要“从众”,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有远见的,更加凸显了基于民本思想而主张“从众”的历史价值。

第三,《周易程氏传》中的爱民与教民,直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对把民本思想上升到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生产力是推进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劳动人民就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对君臣民关系的分析中,也很重视作为统治者的君臣和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之间的关系,鲜明地提出君臣既要爱民,又要教民,爱民和教民并重,围绕爱民和教民施善政,是很深刻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可以认为,爱民可以起到保护生产力的作用,教民可以起到发展生产力的

的作用,这就从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体现出民本思想,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对于爱民,程颐特别强调了“济民”与“安民”,认为“济民”是“资生”,符合王法天道,可以赈济于民,又认为“安民”是维护治安,保民安宁,使民志定,安民心,显然,这些都可以起到保护生产力的作用。对于教民,程颐特别强调了民风教化,移风易俗,重视养成教育,显然,这些都可以起到发展生产力的作用^[4]。为了爱民与教民,程颐还提出统治者要施善政,认为施善政是人君之道,可成文明之治,显然,这些都有利于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演进也证明,当社会矛盾尖锐、特别是封建王朝在建立初期的时期,封建统治者对老百姓就采取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但是,这种情况总是不能持续下去,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老百姓总是得不到真正的爱民和教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之所以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周易程氏传》从民本思想高度提出爱民与教民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 [1] 程颐. 周易程氏传[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
- [2] 程必定. 二程理性主义价值观及当代借鉴[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3):81-86.
- [3] 杨向奎.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17.
- [4] 程必定. 《周易程氏传》家国情怀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J].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9(3):64.

Origin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Subjects, and People in the Biography of Changes Written by Cheng Yi

CHENG Biding

(Anhu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Circles, Hefei 230051, China)

Abstract: *The Biography of Changes Written by Cheng Yi* deals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subjects and people. It advocates respecting and persuading the monarch, choosing and supporting the subjects, and loving people and teaching people, all of which is rooted in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It inherits the gene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Key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subjects and people;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the Biography of Changes Written by Cheng Yi*; Cheng Yi

[责任编辑 夏强]